

(五十一)

《沧桑拾遗》 (五十一至六十一)

老将主持 副刊内容多姿多彩
初哥参与 电影评论似是似非

(系列柬埔寨回忆录)

编者按：

老牛（吴长桂）凭其惊人的记忆力，在移民美丽的花都（巴黎）后，写下了《沧桑拾遗》（1—63篇），展示了上世纪中叶前后柬埔寨华侨社会的文化教育、商情民俗、医疗康体、创报结社等等的人和事，文笔流畅，情节生动，鲜有所闻，史料极为珍贵，值得收藏。

作者简介：

老牛，原名吴长桂（吴春荣），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柬埔寨金边市。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首都金边华文最高学府“端华中学”，为该校专修（高中）班第三届毕业生。曾任柬埔寨《棉华日报》和泰国《新中原报》编辑。现居巴黎。

广西大学陈雅灵教授《汉河与溪流——中国与东盟语言文化论丛》

（作者：陈雅灵//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06-01//ISBN: 9787509619957）

书中提及柬埔寨文学，将“老牛的十八乐章”作者说成是“郑书平”（该篇原话：“柬埔寨郑书平的《沧桑拾遗》”）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沧桑拾遗》作者“老牛”不是郑书平，而是吴长桂。

中柬建交前夕，为迎接新时代来临，长期沉隐于后方的柬华左派精英，纷纷走向台前。潘丙、张乔、张裕厚……等爱国知识分子，联合工商界知名侨领陈继述、黄盛遭、邱成章……等发起创办一份爱国进步报刊——棉华日报。报社是以募股集资形式成立的。当年除各大股东为坚强经济后盾外，更重要是获得金边各大小商号热烈支持，慷慨解囊，各省四乡爱国侨胞踊跃认股，使报社得以顺利展开工作。

棉华日报创刊于1956年7月30日。初期社址设于育干托公主街118号。因业务发展迅速，版面不断扩张，工作人员日渐增多，原址逐渐不堪负荷，遂于1957年中迁往邻近“下市仔”的屋也奥伦街17号，直至1967年9月13日被柬埔寨新闻部勒令停刊。

报社成立之初，由黄天成任社长，潘丙为总编辑，经理张裕厚。端华中学改政后，张经理被礼聘为端中专修第一届班主任兼任思想指导，兼授语文、历史两科，其棉华日报经理一职便由张乔接替，后来又转为伍慧文担任。1958年为适应柬华社会新形势，报社进行人事调动，社长重职由潘丙担纲，林振寒为总编辑。1964年因民生中学改组，林总编辑另膺重命，前赴担任校委副主任一职。其总编职务由林永青代替。1965年柬埔寨政局风云突变，施哈努亲王左右摇摆，董事会领导当局为未雨绸缪，特拨出部分资金，开办“艺新印务局”。并委任伍慧文为印务局经理，

而棉华经理一职由周德高接任。

棉华日报从创刊到停刊,经历了十一年又两个月的风风雨雨,始终坚持立场,坚守岗位,在各个新闻版面上,为推动中柬两国友好关系,激励侨胞的爱国热情,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加强侨社团结工作,支持侨校、侨团进步事业,不遗余力作出积极贡献。新闻报导翔实、快捷、全面,社论、时评立论精辟、分析中肯。而副刊更是七彩缤纷,独树一帜。

棉华副刊,除我编辑的“世界之窗”版外,其余版面全由黄天成、卢雪梅“夫妻档”全权负责。梅姐和天成兄都是多才多艺的文化工作者,在他俩主持下的棉华副刊办得十分成功,内容包罗万象,多姿多彩。

“小说天地”深受欢迎,读者男女老少,商人店员、工人学生都有,十分普及。当年梁羽生的几部武侠小说“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在此每日连载,成为市民每日必读,津津乐道的内容。

“综合”版内容更为广泛:“答读者问”专栏不时给侨胞排忧解难。

“医药卫生”让读者对保健、用药、治病、护理、饮食等生活常识有进一步的认识。该专栏还聘请西医蔡汉文博士、中医黄步让先生为读者解答各项医药难题。蔡汉文博士乃柬埔寨医科大学高材生,后期还被中华医院礼聘为长期驻院医师,他也是我专修时期同班同学黄慧卿的舅父。而黄步让医师在金边行医经年,医术精湛,与赵令勳、林奠刚、王伯年、范仲恒、许导三等中医师驰名于金边中医界。

“答小朋友”、“学生园地”更成为少年学子的精神粮食。特别是“文艺学习”版深受社会青年和中学生

的欢迎。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柬华青年充满爱国激情和追求进步的年代,而“文艺学习”版正好为他们开辟一个研究、探讨、创作和发表文艺作品的平台。为了提高社会青年和学生的写作水平,让他们对新生事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梅姐和天成兄两夫妇多年来投下不少心血,尽心尽力经营“文艺学习”这个栏目。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文艺学习”版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年轻人的肯定和支持。

而当年刘根撰写的“非文人随笔”专栏,由于立论精辟,见解独特、主题健康、说理雄辩、兼之文笔流畅、内容丰富、语言风趣,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当年棉华创刊还特地开辟一个“文娱”版。主要是介绍中国大陆、香港“长城”“凤凰”“中联”“新联”“新新”各左派制片公司出品的影片。为了让观众们更好欣赏影片的情节、内容,更深入领会影片的主题思想,从中获得教育,提高认识水平,加强爱国思想意识,梅姐特地组织了一个“影评组”。这个小组除他们夫妻外,还加上马桂阳和我两名成员。记得当年“金塔戏院”公映每部影片之前,必先举行一场茶点会,热情招待各华文报刊的记者、编辑们,让大家先睹为快,吃过了点心,欣赏了电影,自然为影片作免费宣传。而影评组成员间中选择部分较为优秀作品,向广大影迷推荐。当年国产影片确有不少是精彩绝伦:崇高的革命精神、伟大的英雄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意义深长的思想内容,都是影评人笔下的重心。由于梅姐是位有心人,我和桂阳在文学修养上本属泛泛之辈,岂敢担纲影评人之重职?可是当年我俩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

(五十二)

组织严密 报社运行有序
人才齐全 同仁合作无间

着“过人”的胆色，既然主持人有心栽培，也就大胆上阵。久而久之，倒也写得头头是道，有板有眼。如今回忆往事，实是啼笑皆非。记得当年金塔戏院放映“自有后来人”（同一故事后被改编为京剧“红灯记”）这部影片，影评组成员欣赏之后，梅姐马上分工：她是主将，负责全面分析影片的思想内容，强调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坚毅不屈与敌人斗争到底，而取得伟大胜利。桂阳主写女主角李铁梅这位革命后代，如何在奶奶、父亲等革命前辈们的教育和影响下，在革命斗争中日渐成熟，从而继承了父辈们的革命事业。而李玉和的形象就由我这个毛头小子去描绘和发挥……。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笔下，每一部中国大陆出品的影片都是健康的、精彩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是完全值得一看再看的。

其实，我参与影评组的工作，真是勉为其难。一个专修毕业不久的学生，能力有限，经验不足，见识肤浅，何德何能对影片妄加评说？然而在那一切以爱国思想为主导的年代，只要是祖国出版的作品，无论是电影、戏剧、小说、杂志、诗词、歌曲……，必须从“大方向”去置评，必须以“正确的”尺度去衡量，必须歌颂和赞美，批评和揭露则绝对是在禁止之列。这样的评论文章难免会误导了读者，尤其是误导了青年读者的思维方向，非但不能培养年轻人客观、全面、准确地看待问题，反而引导他们走进盲目崇拜的死胡同。这也是当时的思想局限所造成的偏误。

正是：老将主持，副刊内容多姿多彩；初哥参与，电影评论似是似非。

在柬华文化阵地上，“棉华日报”可说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从56年7月至67年9月，前后十一年，在潘丙社长领导下，在全体员工努力下，她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守自己的岗位，为增进中柬友谊，发扬爱国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侨胞团结做出巨大贡献。

“棉华”在柬华社会奠定的地位和拥有的知名度，是全体工作人员经年累月辛勤劳动的结果。严密的组织、细致的分工、明确的任务，是报社取得优异成绩的最佳保障。从社长、经理、总编到编辑、记者、校对、排字与印刷工友、营业员……，都把报社当成自己的家，都在维护这个大家庭而默默地努力工作。积极的态度、追求上进的事业心，使近百位工作人员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强团队。

棉华编辑部是报社的灵魂，多年来，曾拥有众多出色的编务人员。从早期的林振寒、刘根、黎振华、林超泉到后期的林永青、杨文、黄森、江锦伟、朱达、郭亮天……，个个都是才华洋溢、经验丰富的人才。林振寒非但是报界的精英，在教育界还是担当重任的一把手，曾出任民生中学校委会副主任、桔井中学校校委会主任。刘根离开棉华后，创办了生活午报，在他主持下的这份报刊成绩斐然，甚获普罗大众欢迎，其以“卢根”为笔名的专栏，更脍炙人口。黎振华是位中法双语突出的人才，先后出任生活午报总编、端华中学法文导师，在新闻界和教育界都赢得人们的

赞誉。林超泉原属棉华国际版编辑，因工作需要，转往端华中学任教务委员兼授专修语文课，后与林萌老师随同林振寒北上桔井担任中山学校教务主任（训导主任一职由林萌老师担纲）。当年，“三林上桔井”成为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编辑部除编务人员外，还包括校对组、翻译组、电讯组、记者组和资料室。校对组初期组长是罗华兄，后由李安接任，陈裕坤、郑映明、吴银桂、马桂阳和我都曾是这个组的成员。翻译组分法新社和柬新社两个部门，中柬双语都有一定造诣的张允隆和曾环，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十分出色。电讯组主要收听中新社和北京电台的新闻报导，陈国强的工作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记者组更是人才济济，初期杨文（王启文）担任组长，官方记者是周德高、侨团记者曾钊华、体育记者郭亮天，郭亮天任编辑后，由杨景新接替。后因人事调动，杨文荣升主笔，专职撰写时评。记者组长由周德高接任，吴文兴（吴喜）负责采访官方新闻，张锡荣专职报导侨校、侨团、侨社的动态。

排字部是个庞大的组织，当年还没有电脑排版技术，全部都是铅字排版，手工操作。排字部分日夜两班：日班专职副刊版块，因副刊的文章没有紧迫性，较能灵活处理，排字工友投入的时间虽较长，精神上却没有太大的压力；夜班在短短四个钟头里，必须分秒必争完成几个新闻版块的任务，故没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熟练的工作技巧，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这个岗位上难以胜任的。棉华排字工友大部分出生寒微，却都有一颗热爱工作、热爱集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心。不少工友还是厦门大学函授生，努力自修让他们的学识突飞猛进。朱达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

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排字工友，优异的表现让独具慧眼的潘社长非常赏识，破格提拔为地方版编辑。

利家伟等同事负责的机房重地，也是一个工作紧张的部门。每天凌晨三时左右必须下版开机，一个多钟头后就要出报。这时成群结队的派报工友齐集报社门前，争先恐后地催促发行组长陈志兄分派报纸。因为这些派报工友，并非报社的职工，他们大多数是街边小贩，商店杂役或小职员，也有家境贫寒的在读学生，为了生活必须每天一早兼职派报工作，藉以增加微薄的收入。当年柬埔寨的下层市民，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

一个健全的报社，除编辑部、排字部和机房外，营业部控制了整个报社的经济命脉，能否正常顺利运作，也至关重要。报纸的销路、广告的收入与报社发展息息相关。棉华日报能从创刊初期销路四千份，直线上升到后期近万份，这一骄人成绩是全体员工通力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营业员们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从经理伍慧文到营业主任张乔、发行组长陈志、公关组长马桂阳、出纳员高坚、寄报员黄大利、吴乙序……大家都在为报社的发展，为报纸的销路想尽办法，绞尽脑汁。特别是马桂阳同事自被潘社长委任为公关组长后，不负领导的期望，历尽千辛万苦，深入各省四乡发展与侨团、侨胞的友好关系，让棉华日报这份爱国报刊畅销全柬各地，让棉华的名字响遍偏僻的每个角落。

正是：组织严密，报社运行有序；人才齐全，同仁合作无间。

(五十三)

照顾有加 缅怀报社诸同事
关怀备至 难忘总编林永青

“棉华”——一个多么亲切，不能忘怀的名字！从参加棉华篮球队到报社被勒令停刊，我与棉华结了整整八年之缘。八年，在人生旅途中，不是一段短暂的历程。八年中点点滴滴的生活片段，无论欢乐烦恼，无论顺意逆境，酸甜苦辣的日子，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篮球场上，球员们练习过程或球赛之后，在团结互助的精神下，大家都能平心静气总结经验，谋求共识，追求进步。彼此相处十分融洽，从不剧烈争论，互相埋怨，更不会明争暗斗。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棉华”争光，为报社构筑一座友谊的桥梁。多年来，集体的生活让我们这批年轻人健康成长，让我们的思想更臻成熟。

在编辑部三年的学习和工作，尤其是与同事们的相处，让我对人际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棉华日报社在潘丙社长的领导下，同事们可说都是“爱社如家”。大家上下齐心，一视同仁，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强弱，资历深浅，领导者毫无架子，基层员工也绝不自卑，大伙儿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姐妹。这里到处充满阳光，充满欢乐，充满亲情的温暖。那美好、幸福的日子，经常让我对比较校园的生活，令我感慨万千。当年，念专修班的日子，由于训导处过于强调学员们的“思想教育”，长年累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无时不刻的思想“检讨”和“改造”，让我们这群本是无邪的年轻学子，心里笼罩片

片乌云，精神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棉华的日子里，所见所闻，所接触的每个人，每件事，对我一生影响至深。我本是一个无拘束的自由主义者，但面对着众多文质彬彬的长辈，一群坦率豁达的工友，无数才华洋溢、满腹经纶的学者，相形见绌之余，自觉多么无知、幼稚和渺小，他们的作风，学识、思想都是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学生学习的榜样。在那崭新的环境里，我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本来难以展开，幸而得到李安、朱达、黄森、江锦伟……等前辈们的指点帮助，才能渐上轨道。在负责“世界之窗”的过程中，排字工友阮松、赵灿、朱文道等同事，热情、耐心的配合，不时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我得以提高业务水平。同事们的鼎力支持和照顾，是我追求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他们的真诚爱护，更让我精神上减轻不少压力。四十多年匆匆过去，当年不少给我帮助、对我支持、教我进步的同事，他们可爱、可贵、可敬的形象，至今还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特别是永青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让我毕生难以忘怀。

谈起永青兄，他与我们一家有着深厚的渊源。想当年，大家都蜗居在同个楼层中：四十平方米的地方分割成两个小房间，各自棲身着一家三口。我与父母亲同住；永青兄新婚不久，刚娶了一位漂亮、能干而又贤慧的太太，小两口起居饮食又有岳母大人照顾，幸福的日子可想而知。永青兄的太太叫吴银桂，报社同事都尊称她为“桂姐”，不少人都以为桂姐是我的堂姐。其实我们扯不上任何亲戚关系。由于大家都是邻居，起居饮食互相关照，日长月久，自有深厚感情。桂姐性格开朗，为人热情豪爽，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是她优良的品德。她与家父、家母长年相处，亲如

一家。家母膝下无女，更视她如亲生，我也敬她如大姐一般。永青兄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说话慢条斯理，有节有奏，办事细心谨慎，绝不马虎，为人和蔼可亲，毫无脾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报社，同事们管他叫“小林”，虽贵为总编辑，却毫无领导架子。虽也有人批评他太过“好好先生”，欠缺强人气魄，但报社上上下下，无论男女老少都认为他是一位人缘好，凝聚力强，受人尊敬的好领导。而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思维缜密，办事认真，为人厚道，原则性强的好干部。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左倾思潮泛滥成灾的年代，他从不高谈阔论，盛气凌人，而是日以继夜，默默地把全副精神投在工作上。高度的责任心和稳重的处事风格，深获潘丙社长的赏识和信赖。

永青兄不但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也关心爱护：为了提高员工们的文化水平，在他领导和组织下，报社成立了两个“语文进修班”。初级班由我负责，原因是我曾在中文夜校任职多年，对教学驾轻就熟，这个班的主要成员是排字部和电版制作部工友，还有几位中华医院的护士。学员中有中院护士的原因，是因为中院产科医师曹红玉大姐是潘丙社长的夫人，两个机构关系密切，工作人员交往十分频繁。初级班学习的课程，采用初中一年级教科书。至于高级班是采用“厦门大学”函授预科的教材，学员们必须拥有初中毕业的程度。他们大都是“厦大”函授生。负责教职的是棉华主笔杨文兄。杨文兄在担任主笔之前，曾任采访组长一职，并经常以“王启文”笔名撰写时评和特稿。其文笔简练优美，思路广阔，立论精辟，主题明确，甚受读者欢迎，是一位难得的报界人才。

正是：照顾有加，缅怀报社诸同

事；关怀备至，难忘总编林永青。

(五十四)

着意栽培 社长慧眼识贤
同心奋斗 新人良材成器

在柬华报业发展史上，“棉华日报”确是一份旗帜鲜明、影响深远的刊物。在潘丙社长领导下，全体员工齐心协力，精诚团结，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让“棉华日报”这份爱国刊物成为广大侨胞的精神粮食。十一年间，“棉华”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始只有四千份的销路到后期近万份的骄人成绩，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也是广大爱国华侨支持和爱护的结果。

我在棉华近三年的生活和工
作，深深地体会到，棉华确是年轻人锻炼和成长的最佳场所。在领导们关怀爱护下、前辈们指导培养下、同事们通力合作下，只要珍惜那难得的机会，真心实意地向前辈们学习请教，加上自己刻苦努力进修，不断充实，必定会取得优异的成绩。朱达、伍慧文和马桂阳几位同事的脱颖而出，就是有力的证明。

朱达兄排字工人出身，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逃避兵役，从南越来到柬埔寨，适逢棉华创刊不久，业务发展迅速，人手欠缺而进入棉华排字部工作。由于刻苦好学，追求进步，加之天资过人，深获潘社长识赏，晋升为地方版编辑。朱达兄为人谦虚、待人

和蔼、心胸广阔、处事谨慎，是同事们的好兄弟。他不但爱好文学、关心政局，对数、理、化等科学知识也颇有研究，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我进入棉华工作之前，我与朱达兄曾是中文夜学的同事，我负责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他是初中二年级的代数老师。

1965年，柬埔寨爱国侨领集资开办“柬华农牧公司”，并购买大片土地发展农牧业，藉为柬华社会在经济领域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当年朱达被委任为公司负责人助理兼财政。1970年3月18日龙奈政变，农牧场被迫结束营业。他也因使命所驱转进战区。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垮台，他重返金边。柬埔寨内战结束后，他积极参加推动被中断二十多年的中文教育，由于对华社的投入和奉献，甚受人们的敬重，先后被推选为柬华理事会理事，广肇惠中学董事，金边广东义地筹建董事等职务。在柬埔寨内战期间，他因交游广阔，曾帮助不少朋友从越南经柬埔寨逃往泰国难民营，这些朋友如今大部分旅居欧美各国，重新开创新的人生道路，朱达兄也因此为侨胞们做了一件善事。

在报社里，提起“伍哥”的名字，无人不赞赏有加。伍慧文，棉华日报经理，位居报社二把手。却毫无架子，对编辑部同事格外尊重，对排字和机房工友亲如兄弟。“伍哥”生活简朴、作风严谨、性格开朗、处事认真负责、他坐镇营业部，上至营业主任，下至寄报员工，无不对他敬重。他那灿烂的笑容是他的“金字招牌”，他亲切和蔼、忠厚老实、平易近人的可爱形象深入人心。

“伍哥”曾在南越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1956年南越吴庭炎政府为了扩军备战而大量征兵，强迫华侨放弃

祖籍国身份，自动转入越南籍。不少中国侨民为免遭战火吞噬，更不愿成为炮灰，被迫离乡别井，许多青少年辗转来到柬埔寨和老挝。“伍哥”也在这一波逃亡的浪潮中，徙居柬埔寨金边。伍哥原是报馆排字工人出身，进入棉华后，由于表现突出和对事业的忠诚，被潘社长晋升为报社经理，赋予重任。棉华营业部在伍哥管理下，井井有序，营业数字直线上升。

1965年后期，柬埔寨右派开始坐大，中柬友好关系也起了微妙变化，为防患未然，棉华董事会决定拨出一部分资金开办“艺新印务局”，伍哥被委任为印务局经理。1969年右派势力越来越猖獗，形势十分严峻，“艺新”决定结束营业，将所有器材存放于郊区一间木屋，并付托“伍哥”夫妇负责留守。龙奈政变后，伍哥跟随大伙匆忙撤入战区，其太太带着孩子回越南。翌年初春，伍哥不幸中风，在战区缺医欠药的恶劣环境下，满怀遗憾离开了人间。

我与马桂阳相识于棉华篮球队，由于彼此性格、爱好相近，故交往较为密切。进入棉华后，又曾在校对组和影评组共事多时，大家一起学习、交流经验，共同进步。桂阳是一位十分谦虚好学的年青人，办事认真可靠，为人忠诚踏实，交友推心置腹。也许家境关系，自幼在大风大浪中历经磨练，在困境中勇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坚强的意志，让他敢于克服重重困难，他的乐观精神，让他对未来永远充满信心和希望。

少年时期的桂阳，和许许多多贫困的孩子一样，蜗居于红土路、菜园区一带。这里到处是茅寮和木屋，卫生条件极为恶劣。桂阳的父亲曾经营一间颇有规模的“神香”手工作坊，家境本来也算宽裕，可惜1954

年菜园区一场大火烧毁了近千间茅屋，几乎半个菜园区顿成灰烬，他父亲半生心血也因这场大火付之东流，从此家道中落。刚念完小学五年级的桂陽被迫放下书包，到新街市叔叔的档口帮忙，期间曾回到夜学班补习。两年后，家境稍为好转，才回到新民学校继续完成小学的课程。高小毕业后，为了分担家庭重担，开始走进社会，这期间当过学徒、街边肩挑小贩，制造“神香”师父。为了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还争取工余时间到夜校补习。同时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年青朋友成立了学习小组，并开始参加体育会活动。在华光体育会中认识了棉华日报职员郑英才，1962年在英才兄的介绍下进入棉华日报当寄报员。进入棉华后，由于刻苦努力进修，积极工作，终于获得潘丙社长器重，先派往编辑部校对组锻炼一年，而后晋升为营业部公关组长，专门负责外埠的收账工作，更重要的任务是在访问各省四乡的过程中，加强和促进报社与各地区侨校、侨团的联系。这期间，他还报读“厦门大学”函授进修班，完成进修班学业后，本想继续攻读厦大语文课程，可惜因工作繁忙而放弃。

1967年9月13日柬埔寨所有私营中文报纸被勒令停刊，桂陽因运送“告读者书”一事被安宁部起诉，1968年竟被“流放”到磅通省“薄波”集中营。经多方奔走，一年多后获得释放。1970年龙奈政变，桂陽随着大伙进入战区。在战区四年多的见闻，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后来撰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写实回忆录——“战区足迹”。

在“战区足迹”这部回忆录中，他通过零零星星的写实，反映出上世纪七十年代印支华侨，特别是柬埔寨华侨青年与当地革命错综复杂

的关系。这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辛酸历史。当年大批柬埔寨爱国华侨，抱着国际主义的精神，怀着支持柬埔寨革命事业的理想，纷纷奋不顾身投入战区。他们除了少数是“华运”成员外，更多的是热血方刚、满怀激情的教师、学生、工人、店员和文化工作者。这批年轻人进入战区后，美丽的愿景、崇高的理想面对残酷的现实完全破灭。华运成员虽能正式在“解放区”公开亮相，可惜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满腔热血，完全不能得到柬共的认同和容纳，在四年多的战区岁月里，不但生活在极端的困苦环境，人生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不少华运成员被柬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杀害，更多的爱国华侨精英经不起弥漫着山岚瘴气、欠医缺药和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的折磨，而断送了可贵的生命。

当年桂陽在错综复杂、风云突变的环境中，以他的聪明机智，度过重重的风险，冲破道道的难关，安然免遭赤柬的毒手。在柬共夺取政权后，平安抵达越南。可是“才出狼窝，又临虎口”，因中越两国交恶，他又一次不幸在1978年5月30日被越南政府逮捕入狱。在“志和大牢”呆了五年，83年被流放西宁市黑婆山下的“边生”集中营，85年逃出集中营，经柬埔寨到泰国难民营，而后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

如今的桂陽已届古稀之年，但仍然容光焕发，精神充沛，对华侨进步事业的参与不遗余力，目前还担任加拿大多伦多端华校友联谊会会长之职，为会务发展竭尽余力。

正是：着意栽培，社长慧眼识贤；同心奋斗，新人良材成器。

(五十五)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一代风流
历经坎坷 留取丹心 万人景仰

我在棉华报社生活了近三年，深深感受到“棉华”就是一个充满温馨、欢乐、和睦的大家庭，同事们团结友爱如兄弟姐妹一般。我们非常庆幸能在潘丙社长的领导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断锻炼、不断成长、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思想认识。潘社长是一位立场坚定，作风严肃，重原则，明是非，讲道理，有分寸的领导者，严格中有宽松的一面，重视大方向而不拘于小节。他生活朴素，工作认真，待人和蔼，处事公允，从不摆领导架子，对报社员工一视同仁，与员工亲密无间，大家没尊称他“潘社长”，而直接叫他“老潘”。他对员工耐心开导教育，从不随便“扣帽子”，更不会将持异见者置于死地。近百员工在他的关心、照顾下，真心实意做好本份工作，把报社的进展当成自己的责任，报社取得优异的成就，就是自己的光荣和骄傲。

潘丙的一生经历曲折多艰，充满传奇色彩。

父亲潘于宝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由于祖父早逝，潘于宝与寡母相依为命，家境特别贫困，自幼没机会上学读书，却要像成年人一样耕田犁地。在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年仅十二岁的潘于宝就跟随乡亲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越南中祁广义省谋生。经过十多年胼手胝足，埋头苦干，终于干出一番事业，就在广义省山静县巴加村落籍，置田建屋，成了当地大户。于是衣锦荣归，

回到海南家乡娶亲。有了发妻后，他又在巴加村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为他料理家务和经营生意。潘丙是三姨太太所生，在兄弟中排行第六，就是海南话所称的“续尾仔”。

潘于宝虽自幼失学，但一生历尽磨练，况且天资聪颖，刻苦自修，学到了许多知识，特别喜爱中文和民族历史，最怕儿子变成“安南仔”。他对儿女要求甚高，按传统，每个孩子到一定年龄都得回海南家乡，听由祖母的安排和教导，并在大母亲的带领下，从事农耕劳动，既养成劳动习惯又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在农余时间上学，学习中文。潘丙兄弟六人中，除二哥能够去广州读高中外，其余兄长只读了几年村小学，就回越南帮助父亲料理业务。少年潘丙在海南家乡一面读书，一面帮忙农务，生活了几年。家乡的贫困落后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下层百姓的不幸遭遇和苦难深为同情，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变革社会的理想。

潘丙在家乡呆了几年后重返越南，由于当年广义省没有开办中文学校，就被父兄送入村里和市里的法越文小学就读，希望他成人后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玛真”（即洋人的买办）。但三哥觉得完全接受外文教育并非良策，于是在他读了三年法、越文后，决定送他到皇都顺化的立成学校学习中文。在三哥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下，后来又以优异成绩转入会安市兴华中学。之后前往堤岸知用中学继续升学，最后考进西堤的南侨中学。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挥军南下，并对西贡等大城市狂轰滥炸。为免遭战火波及，南侨中学迁往南部的槟知省，在一处椰林中继续办学。学校就在以椰树干支撑、椰叶覆盖的“校舍”中继续爱国教育工作。

潘丙在南侨中学完成学业后，进入西贡一间左派爱国报社任编辑工作。战后报社由于大力宣传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冲击了法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根基，最后被当局查封。为了追求理想，青年潘丙辗转来到了金边，随即被礼聘为“现实日报”编辑。其时适逢中国解放战争，“现实日报”大量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消息，深获广大爱国侨胞的拥护和支持。由于法殖民当局深怕现实日报的爱国思想和进步言论对当地侨胞的巨大影响，最后也被法国殖民政府勒令停刊。

现实日报被封后，潘丙毅然进入柬埔寨反法战争解放区，参加印支人民的抗法运动。1954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正式宣告结束法殖民主义者在印支三国近百年的统治，柬埔寨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独立后的柬埔寨王国，在施哈努克国王的领导下，执行独立、中立、不结盟政策，努力游走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希望各大国的援助能够迅速改变王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55年施哈努克国王第一次访问中国，为中柬友好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接着中国经济代表团率先访问柬埔寨，两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在此大好形势下，为了夺取华侨社会的主导权，潘丙从战区重回金边，并立即着手筹办“棉华日报”。在他的主导下，联合几位文教界的爱国精英，并取得一群进步侨领的支持，以每股一千元募股形式筹集到一百万柬元，“棉华日报”终于在1957年7月30日宣告诞生。

棉华日报创刊之后，坚持爱国的

立场，并以崭新的面貌展现于华侨社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侨校的改革，努力推广侨社的公益福利事业，加强与各侨团的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了主导舆论，推动侨社进步的作用。1958年，中柬两国正式邦交，两国友好关系进入蜜月期，台湾国府势力终于逐渐淡出柬华主流社会，大部分侨教、侨报、侨团和文化机构都掌控在进步力量的手里。棉华日报对柬华社会的影响力是与潘社长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他对团队内每位同事的关心、信任和培养造就了一支对事业忠诚而又工作干练的团队。由于拥有这支可靠的队伍，让他能在报社业务之外，参与和推动侨社的多项工作。他先后出任海南会馆辖下的“集成学校”董事、中华医院董事、中华医院扩建筹委、柬华农牧公司董事等。

1970年龙奈发动政变，潘丙举家进入战区。他原是华运组织高级领航者之一，但他与所有战友一起参加劳动，一起推动文教工作，积极为战友们排忧解难，他的努力和付出虽然得不到当局的理解和重视，但他一颗赤诚之心、无怨无悔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崇敬和钦佩。

1975年，印支政权易手，潘丙回到越南，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度平静的生活。料不到风云突变，原是“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1978年竟然恶化。越南当局为清除异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所有“亲中”的爱国华侨，潘丙也在这一波排华的浪潮中被捕入狱，后来在志和大牢蹲了整整十年，才于1992年由儿子担保到德国柏林定居。

二十年匆匆过去，潘社长虽然已届古稀之年，但对柬华社会的关心从

未停止。可惜晚年的他身体欠佳，病魔缠身，对公众事业已是有心无力。2013年8月27日潘老恸于德国病逝。

一代英才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的高贵情操令人景仰，他优良的品德、高尚的人格、坦荡的胸怀、浑身的正气，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潘老的一生，是一代印支爱国进步华人华侨的历史缩影和典范，他对爱国进步事业的贡献终将得到历史的肯定。而他那灿烂的笑容，可爱、可敬的形象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代风流；历经坎坷，留取丹心，万人景仰。

(五十六)

五帮分治 侨贤尽心助乡亲
一会统操 国府无力控大局

中柬两国交往虽有上千年历史，但中国侨民大量移居柬埔寨却在清朝末年开。鸦片战争后，满清王朝国势日衰，闭关自守的国策被彻底打破，从此门户大开。而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沿海居民为谋求出路，只好漂洋过海，远渡南洋各地。泰国、缅甸，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甚至极端落后的寮国和柬埔寨，都成为他们“南漂”之地。

当年南洋各国都已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柬埔寨诺罗敦国王为免遭泰国欺凌和吞併，于1864年与法国政府签订协议，接受法国“保护”，从此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作为“宗主国”，法殖民主义者既不

愿意文化、经济相对于土著人民较为强势的华人融入柬埔寨，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部分，又不愿意把治理外侨的权力交给柬国，于是为便利管理华侨，完全延用越南阮氏王朝“以华治华”的间接统治制度，在柬埔寨华侨社会中成立“五帮公所”。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侨民移居柬埔寨已近三万人，大部分住在首都金边和各大省市。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潮州人，其次是广府、福建、海南和客家人。各方言群体都有一个代表该族群社会的团体。每个帮群都由法国驻柬官方委任一位帮长（俗称“翁帮”），在当局支持和当地侨民认可下，帮长拥有极高的威望和颇大的权力。在金边，五大帮群为了统一管理华侨事务，由五帮帮长组成最高委员会，这就是“五帮公所”委员会。当年潮州帮帮长陈顺和、郭恒长、广府帮帮长凌继璋、福建帮帮长郭正中、客家帮帮长马伯洲等知名人士，都曾是委员会的领导人。至于各省市由于华侨人数不多，各帮群并不分立，而是五帮联合并统一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帮长。

“五帮公所”主要的任务是派员常驻“移民局”，协助当地政府办理华侨出入境登记，申请身份证，缴纳身份证税，出具婴儿“开生纸”（即“出生证书”）和逝世者的“死亡证”。帮长更重要的职责是代替政府向华侨传达命令，征收税项，签发营业执照，同时负责调解侨胞间的民事纠纷。“五帮公所”辖下的“调解委员会”类似于今日的民事法庭。委员会由各帮推派代表担任，专职解决侨胞间的家庭纠纷、婚姻变故以及钱债纠葛，务使侨胞间的矛盾得以内部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以致闹上“衙门”，缠上不必要的官司。当年复兴书局东主李少阁（曾任端华学校训育

主任，后任董事会董事）、彭民生商行东主彭国栋、鸿茂进出口行东主陈章光等社会名流都曾代表潮州帮出任“调委会”委员一职。并以认真、慎重、公允的态度为侨胞们担任“公亲”，恪尽所能为广大侨胞排忧解难，他们积极服务侨众的可贵精神，甚获侨众的好评。

法国殖民当局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不希望华侨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人民的一股力量，所以极力阻止华侨归化柬埔寨，但也不轻忽对华侨社会的管理。故对华侨组织社团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允许华侨在“五帮公所”的架构下，广组各种民间团体，因此除“五帮公所”直辖下的“中华医院”、“调解委员会”和“华侨图书馆”外，其他如“华侨总工会”、“华侨教育会”、“金边柔道会”、“群乐体育会”、“凝雪国乐社”、“土产公会”、“洋货公会”、“织造公会”、“出入口商公会”……等各社会团体和行业公会先后宣告成立，并积极展开各项活动。如“华侨总工会”有八个属会，另设“中正工人子弟学校”，兼办工友福利事业；“群乐体育会”由广府帮主办，该会除体育活动外，并有阵容强大的粤剧组；“凝雪国乐社”社员多属潮州人，以演奏潮乐为主，后期也演出潮剧，甚受乡亲们欢迎。

当年“五帮公所”设于安英街（大街）北端，靠近集中市，离“长花园”近百米的庆林寺内，与梨春戏院（老玉春香班潮剧团常驻地、后改为中国电影院）斜里相对。“庆林寺”的业主兼住持是一位来自越南的华裔师太，寺中还供奉观音菩萨。寺前有一座面积不大，却名扬金城的“本头公庙”。一年四季香火兴旺，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来此膜拜祈福。“庆林寺”内有一栋长二十多米，宽

十六米的双层楼房，这就是热情慷慨的女方丈赠与“五帮公所”长期使用的办公大楼。大楼的底层是“华侨图书馆”。图书馆专为华侨子弟而设，两旁的书橱藏书甚丰，内容包罗万有：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电影、艺术……应有尽有。市民们不但可以经常来此阅读，还可以凭证外借。不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是这里的常客。当年图书馆可说是侨胞们精神粮食的仓库。而大楼的上层就是“五帮公所”会议厅和办事处，帮长们经常在此讨论、解决侨社的重大事件。

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为更好控制海外华侨，特向法殖民当局提出取消“五帮公所”这一组织，另设“中华理事会”取代之。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包括中国也已进入新旧力量决战阶段，殖民地政府当然不希望左派进步力量进入其统治范围，是以1948年9月28日法当局同意国府之建议，正式颁令取消“五帮公所”。随之“中华理事会”也宣告成立，并颁布新组织条文，其内容与过去帮长制度大同小异，惟理事长人选须经当时“国府”驻柬领事馆领事许鼎批准。“中华理事会”成立之后，金边潮籍殷商黄化龙、粤籍知名人士徐自克（曾任广肇惠中学校长）曾先后担任该会理事长一职。

柬埔寨独立后，由于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府在柬影响力逐渐式微，“中华理事会”形同虚设，已无能力管控华侨社会的大局，不得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中柬正式邦交后，左派势力开始抬头，并不断掌控侨社和各个侨团的领导权，至此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获得迅速发展，柬埔寨华侨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五帮分治，侨贤尽心助乡亲；一会统操，国府无力控大局。

(五十七)

乐己乐人 曲艺社一枝独秀
有声有色 体育会遍地开花

高棉独立前，在法殖民当局统治下，“五帮公所”是华社的最高组织机构，专责统筹一切有关华侨事务。1948年，法国当局接受国府要求，取消“五帮公所”并成立“中华理事会”取代之，以便更易掌控华社领导权。

当年除“五帮公所”或“中华理事会”外，法殖民当局还特准华社组织“没有”政治倾向，只搞体育、文娱或福利工作的次级社团。因此在金边也涌现不少同乡会、慈善会或各行各业公会。如：顺德同乡会、三水同乡会、华侨慈善会、中华体育会、侨青体育会、群乐体育会、金边柔道会、南声南乐社、凝雪国乐社及洋货、杂货、土产、中医、牙科、珠宝、五金、织造、渔业、木业、旅业、潮屠、广屠、酒楼、粿条、咖啡、制履、轮船、单车、摩托……等公会。不过因为规模小、会员少，况且组织松散又缺乏常规活动，故对广大市民没有多大吸引力，也难有太大作为和发展空间。

不过，也有几个社团办得十分出色。“群乐体育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群乐体育会”是“谊民剧社”

和“余闲之声”合并而成。至于“群乐”之命名，则是当年广帮理事长徐自克所取。徐以“群策群力、乐己乐人”建议取名“群乐”，获上述两团体领导人一致通过。“群乐”成立后，由于粤剧组阵容鼎盛，第一炮演出“貂蝉”佳评如潮，奠定其在华社的地位。潮州人主办的团体则以演奏潮曲的“凝雪国乐社”较为成功，三、五成群的唐山大叔都是凝雪的常客，宾主欢聚一堂，共赏乡音、共叙乡情，也是人生一乐。而以福建侨商和青年组成的“侨青体育会”也极负盛名。其成员以操五金业、废旧汽车拆卸业为主。该会主要发展体育运动，特别篮球运动在黄克教练指导下，成绩斐然。

高棉独立后，群乐、凝雪、侨青三个社团，由于根基稳固、会员众多，不但能继续生存，甚至获得进展。

六十年代的“群乐”，在会长邝钊信领导下，自资建立了会所，落成之日，广邀各兄弟团体莅临盛会，并演出多幕折子戏。时任金边市长的狄潘大臣也应邀剪彩，酒会冠盖云集，一时传为佳话。

“凝雪”的发展更是与时俱进，在广东潮剧团访柬后，深受姚璇秋、范泽华、黄清城、翁鑫金、郭石梅、萧南英……等潮剧演员精湛演技的影响，该社力事革新，积极培训新秀，全方位向潮剧进军，终于成功推出潮州传统名剧“陈三五娘”等。

而“侨青”更因新人辈出，迅速崛起，民生中学不少学生都是“侨青”的生力军。其中林勇智的加盟，更让“侨青”男篮如虎添翼。林勇智后来成为柬国家篮球队主力队员。

中柬建交前夕，金边侨社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让新生的柬埔寨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尤其是施哈努亲王和周恩来总理的互访，让两国关系更迈进一步。在此大好形势下，不少左派精英陆续走到台前，大力发展侨社的文化教育事业，办学、办报、组织爱国团体、借此向华侨进行爱国、爱乡、爱当地的教育，鼓励华侨热烈支持当地的建设事业，促进中柬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侨界先后成立了多个体育团体。

芸芸众多的体育团体中，“东方”、“职工”、“华光”三个体育会办得有声有色。“东方”的会员主要来自华校教师和学生；教师是初期的发动者，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积极参与。他们是比较有知识、有见地的一群，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关心群体活动。“职工”的成分比较广泛，除教师、学生外，店员、工人都是他们发展的对象。“华光”比“东方”“职工”两会成立时间较迟，却有后来居上之势。工厂女工、家庭妇女、医院护士、肩挑小贩、商店杂役、各行各业学徒都比较喜欢“华光”他们普遍认为“东方”和“职工”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天下，“华光”较为接近平民百姓，更易与下层群众打成一片。除上述三个体育会外，在金边华社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以广府人为主的“艺联”。“艺联”的成员多数为机器工人，也有少数文教工作者，当年端华学校教师叶炜洪、曾纪谋、曾家杰都曾代表艺联男篮出征“全柬杯”。而海南人较为喜爱的是“中青”、“联友”，两会以餐饮界工人为主体的，也吸收不少“白衣天使”。“工学”的主要会员是售货员和经纪人。文艺爱好者大都参加“新青”，其他还有“劳声”、“青联”、“中体”……等。而部分大机

构如棉华日报、工商日报、湄江日报、生活午报、中华医院……等，也都有他们的体育组织。

六十年代，柬埔寨华人体育会遍地开花，文康活动蓬勃发展，这些体育会不但丰富了华人的文娱、体育生活，更为柬埔寨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队培育了不少优秀运动员。

正是：乐己乐人，曲艺社一枝独秀；有声有色，体育会遍地开花。

（五十八）

扫除旧弊害 新兴国家励精图治
建设新文明 进步团体应运而生

高棉独立初期，施哈努亲王面对百废待兴的破旧家园，如何改变其贫困、落后的面貌，确是一个新兴国家所急需解决的艰巨工程。亲王以他超人的智慧、圆滑的手腕，在外交战线上奉行独立、中立、不结盟政策，努力游走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内政方面，采取全方位社会改革，大刀阔斧严厉取缔黄、赌、毒等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行业，力求给国家和民族展现崭新的面貌。在亲王强力推动下，首先勒令关闭“大金城娱乐园”，接着又将“跑马埠”夷为平地。扫黄、扫毒工作更是雷厉风行，金边所有风月场所和鸦片烟馆顿时销声匿迹。昔日流莺遍布的花丝宜街一带显得格外清静，各大小旅店的“应召女郎”也只好另谋出路。以前深藏在弄巷里吞云吐雾的“瘾君子”更难以逍遥自在。

施哈努亲王在推行“扫除黄、

赌、毒”政策的同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庄严宣布“建设文明精神生活的新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展文康活动。在亲王亲自主导下，有关当局首先成立“皇家古典芭蕾舞团”。舞蹈团由哥苏玛太后亲自领导，施哈努亲王的女儿——帕花黛薇公主担纲主角，由此可见当年独立新兴的柬埔寨王国如何重视保存及发展其民族艺术文化！此外，王国政府还组建“国家男女篮球队”、“国家男女乒乓球队”、“国家羽毛球队”、“国家游泳队”……等。并保送年轻运动员前往中国培训，又聘请中国体育教练来柬执教。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既增进两国友好关系，更为柬埔寨体育战线上培育出众多优秀选手。另一方面各政府机关、各大中学校为响应亲王的号召，积极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并把此一工作当成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

而金边郊区的“跑马埗”也在六十年代改建成庄严雄伟、富丽堂皇的奥林匹克综合运动场。运动场由柬埔寨留法归国的建筑师文莫里万设计，外观极富民族色彩。新运动场的落成，标志高棉体育事业进入一个新时代。它不但提供体育健儿锻炼身体、提高技术的好地方，也让各项体育竞赛拥有一个标准的场地，同时还额外为各类艺术表演创造一个宽广的舞台。

华侨社会处此大好时机，也掀起组建体育会的热潮，几年间，由金边到各省，数十个大小体育会就像雨后春笋般宣告诞生。体育会的蓬勃兴起，是与众多有心人的投入和侨社热心人士鼎力支持分不开的。当年不少左派精英，抱着改变社会现状的决心，满腔热血积极参与侨团的重建和创立工作。他们远大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终于取得丰硕成果和骄人

成绩。让当年的华社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体育会初建时期，并非一帆风顺。中柬建交前，国府在华社还有相当影响，大部分侨校、侨报和侨团都在其掌控中。直至中柬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左派势力逐渐抬头，首先在潘丙领导下，“棉华日报”顺利创刊，为华社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宣传阵地，而在侨社中拥有极高威望的“中华医院董事会”彻底改组，接着端华、民生两大公校宣告易主。林宏毅、张德潜、黄强钺三位教育界前辈接管端华校政，林仲安、林振寒、苏振明、洪睦民等也先后入主民生。至此，进步人士正式全面夺取各文教团体的领导权，随之各个体育会的顺利成立和发展，更将华社的进步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体育会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他不单增强华侨青年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引导和带动年青人走向正途。独立前后，金边市民文康活动十分贫乏，活动场地除了一个规模极小的市立球场和另一座专为洋人和有钱人而设，座落塔仔山边的“西人俱乐部”所属游泳池外，再难找到其他较为像样的运动场所。而华人开办的学校仅端华、民生、广肇惠和中正工人子弟学校（后也归并于广肇惠中学）拥有自己的操场，其他私立学校，甚至公立的崇正和集成都没有场地供学生上体育课，可见当年金边的体育活动是何等落后。而体育会的成立，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广大市民，特别是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课余和业余时间参予体育会的各项活动，即锻炼身体，也充实生活内容，体验集体生活的同时，有更多机会交朋结友，开拓广阔的交际空间。也可在那温馨、和睦、快乐的大家庭中，发现自己心仪的对象，彼此深入沟

通、了解，进而并肩携手共创美满、幸福的新家庭，让自己的人生更充满青春活力，和增添绚丽的色彩。

正是：扫除旧弊害，新兴国家励精图治；建设新文明，进步团体应运而生。

(六十)

篮场争霸 华裔五虎终成主力
国球流风 侨青群雄屡拔头筹

高棉独立后，在施哈努亲王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体育运动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华社许多体育会的重建或创立，更把高棉的体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从首都金边到各大省市，甚至偏远地区，普遍成立体育团体，开展各项体育运动，体育之花开遍全国每个角落。

为响应亲王号召，王国政府辖下各行政部门、各国营公司、各省市纷纷成立各类型体育组织，如御林军、国防部、内政部、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邮电局、社青团、酒饷公司、工程局、国家银行、（金边）市府……等等，为壮大其体育队伍，四面八方收兵买马、招揽人才，一时间，各路英雄会师金城，选手们为争夺锦标，使出浑身解数，剧烈竞争的场面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各项运动争夺战中，篮球、乒乓两大球类最受广大群众欢迎和喜爱。每当“全柬杯”男篮赛或“全柬杯”男乒赛进入激战阶段，观众都挤得水泄难通。不过，五十年代华侨社会体育运动还不普遍，人们对体育健身活动也不十分重视，故这两大球类

的竞争能力都落后于土著和越侨，篮球是土著的天下，越侨则是乒坛的霸主。

当年，也有部分爱好篮球运动的华侨青年组队与土著一争高低。其中青联队和中体队是两支较为出色的华人劲旅。青联体育会会员大部分是潮州子弟，会长陈继述是潮州帮帮主陈顺和老先生的公子，也是潮州会馆辖下端华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在他率领下的青联篮球队称霸华人篮坛多年，麾下猛将如云，如铁卫庄礼仁、射手罗耀宗早已名闻金城，后期史振茂和冯东成（后为国家队主力中锋）的加盟，更让这支强队如虎添翼。端华体育主任江景浩、篮球校队主力黄绍华也曾效力青联队多年。而中体队实力较为平均，出身于喷吓红白队的陈川龙和林万是中体两大高手。陈川龙防守固若金汤，林万身手敏捷，进攻神速，前锋后卫配合默契，常给敌方极大威胁。端华学校英文教员杨武也曾效力中体队经年，出色的表现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青联、中联两队交锋，平分秋色，各有胜负。后期中体因数位老将急流勇退，新人无力接班，在青黄不接的无奈情况下宣告解体。不久侨青队异军突起，林勇智（后为国家队主力前锋）加盟后，实力大增，终于替代中体队与青联队分庭抗礼。这期间，磅针日出队（其中吴文庆后为国家队主力后卫）、喷吓红白队（其中廖三帆后为国家队主力后卫），马德望马华队（其中林来顺后为国家队主力前锋）先后崛起，多次征战金城，挑战“青联”、“侨青”的王座。至此，高棉华人男篮形成战国纷争的局面。

从法治时期到中柬建交前夕，华人篮坛虽然涌现青联、中体、侨青、日出、红白、马华等较为突出的队伍，但与土著强队较量，仍处下风。

当年御林军队与警察队是土著两大劲旅。警察队的“小霸王”木那号称全柬头号射手，边球命中率奇高，对敌手威慑力极大，故在全柬杯争夺战中，警察队略占上风，多次荣登宝座。但两队因有“枪杆子”作后盾，球员冲锋陷阵，线条粗犷，火爆场面时有发生，往往一场精彩的争霸战，在双方队员失去理智，忘却体育精神的情况下，篮球赛演变成全武行的拳击赛，混乱的局面常让全场观众惊心动魄。

中柬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一日千里，在各个领域上密切交流、合作。这期间，高棉体育总专员署（简称“体总”）为提高国家男子篮球队技术水平，选派多位年轻选手赴华培训。这些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的新生力量，在中国教练悉心栽培下，球技突飞猛进，回国后，效力于社青队。为检验社青队的实力，体总安排与“小霸王”为首的国家队对抗，结果社青队诸将大显神威，展现新的战略、战术和技术，轻易打败了国家队。至此，国家队只好进行全面改组，一支由社青队主力吴文庆、林来顺、廖三帆组成的新国家队宣告诞生。不久，“青联”冯东成、“侨青”林勇智应召入伍，成为国家队“五虎将”。上述五位年轻选手都是华侨子弟，不但个人技术突出，而且配合默契，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一直是高棉国家篮球队的主力球员，在多次国际赛中为柬国争光。

说到高棉乒坛的发展，道路更是崎岖不平。长期以来金边华侨特别是年轻一代较为喜爱篮球运动，对小小的乒乓球缺乏兴趣和重视。金边乒坛乃是越侨的天下，越侨高手潘文深和陈玉洲在每次全柬杯竞赛中，总是宛如秋风扫落叶般，轻骑过关，难逢敌手，长期包揽冠亚军。

1959年，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中，奋勇杀敌，过关斩将，最后以精湛的技术、坚毅不拔的战斗精神在决赛中打败匈牙利第一高手西多，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容国团旋风”席卷神州大地，乒乓球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形成全民运动。两年后，第二十六届乒乓球赛在北京举办。老将容国团、王传耀、张家富带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周兰荪、马金豹、李光祖等小将分头出击，所向披靡。最后庄则栋以超凡的技术，继容国团之后再登乒坛王座。李富荣荣获亚军，徐寅生、张燮林并列第三名，四位中国年轻选手包办此届男乒赛前四名，一时震动世界乒坛。而在团体决赛中，又以绝对的优势战胜由星野、木村兴治、荻村伊智郎三位高手组成的日本队，夺得了第一个团体赛世界冠军。中国女将也不甘落后，邱钟惠全力出击，使出浑身解数，在击败日本强敌关正子之后，闯进决赛圈。面对世界女乒第一号种子日本名将松崎君代，小邱发挥中国人坚毅不屈的战斗精神，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沉着与对手周旋，终于击败强敌，荣登后座，为中国女乒争得最高荣誉。邱钟惠急流勇退之后，新秀林慧卿、郑敏之后来居上，她俩无论单打独斗，或是双剑合璧，都是天衣无缝，难逢敌手，在多届世界乒乓球赛中，包办冠亚军。男女健儿的胜利，不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乒乓球从此也成为中国的“国球”。

流风所至，柬埔寨华侨青年也深受鼓舞和影响，大家对这项运动开始重视，并积极投入。从首都到全国大小城镇，掀起了打乒乓的热潮。这期间，华侨子弟先后涌现一批年轻好手。首先王伯年中医师的二公子，也是端华中学朝阳班的同学王尚武初

露锋芒，在全柬杯男乒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往直前，杀进半决赛圈，并以虎口拔牙的精神，先淘汰越侨高手陈玉洲，后在争夺乒坛霸主的决赛中，机智敏捷，出奇制胜勇克越侨第一高手潘文深，终于让华人首登乒坛王座。而由吴永祥、傅幼庭、齐必腾三位老将组成的五环队，在团体赛中联手出击，奋战九场，终于打败由潘文深挂帅的越侨队。至此越侨乒乓队一蹶不振，日走下坡，由于后继乏人，在金城乒坛上逐渐消失。越侨在乒坛上没落之时，正是华人小将扬眉吐气之日。这期间，男乒选手江楚成（江楚南）、林剑武（柯武）、陈伟才、胡德开、林德坤、吴锦森、李海英、谢德生、刘衍明、……等活跃于各体育会，并先后被高棉体总征召为国家队员。不少选手还被派往中国深造，回柬后，代表高棉参加国际乒赛，为高棉王国尽了一份绵力，也为高棉华侨争取一份荣耀。其中江楚南、陈伟才、李海英等更继王尚武之后，也先后在“全柬杯”赛中，勇拔头筹，夺得冠军。

正是：篮坛争霸，华裔五虎终成主力；国球流风，侨青群雄屡拔头筹。

（六十一）

争独立 求平等 亚新运会成功举办
当翻译 办伙食 柬国华侨通力支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国府败退台湾，蒋介石继续做他反攻大陆的春秋美梦。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既不承认新中国存在的事实，更采取极端卑劣的手段，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企图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于摇

篮之中。而在联合国，更让国府继续窃占新中国的合法地位。甚至每四年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排除在外。

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中国诞生前后，亚洲各国也纷纷独立。这些新兴国家多数先后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万隆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协议的签订，说明新兴国家已开始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新兴国家力争民族独立之外，也积极谋求在国际事务上，包括在体育竞赛中的平等权利，这是时代的大潮！为了加强新兴国家的团结合作，显示这股力量强大的生命力，亚洲新兴国家决定于1966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办“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简称“亚新运会”。这次运动会主要的目的，是与美国操纵下的“亚运会”（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唱对台戏，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柬埔寨王国光荣地负起这一重任。其时，新兴的王国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贫乏。况且从没举办过如此大型的运动会，如何筹划、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确有极大压力。

为保障运动会成功举办，中国政府无条件给予柬国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首先，为柬国在金边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建一座多功能的“体育城”。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拥有舒适的房间让运动员憩息，雅致的餐厅让运动员享用佳肴美味，还有多座中、小型体育场地，可供比赛之用：体操、举重、羽毛球……等项目的竞赛都可在此进行。这座新型“体育城”从蓝图设计、工程开展，全程由中国专家负责。

为了让专家们更好与当地有关

人员沟通，端华学校和民生学校派出不少中、柬双语特优的学生为援柬专家们当翻译员。这些年青的学生毫不犹豫地接受校方领导的分配，暂时放弃学业，积极投身此项富有意义的工作，全心全意为专家们服务。他们出色的表现，获得专家们和有关当局高度评价和赞许。更让专家们顺利完成祖国赋予的神圣任务。

“亚新运会”在金边举办，不但是柬埔寨王国的一件盛事，更是柬埔寨华侨的一件喜事和大事。为了支持祖国和侨居国办好此盛会，金边各进步侨团在爱国侨领和侨干们组织和领导下，积极配合当局开展各项工作。由于有关部门对华侨的重视和信任，特将运动会举行期间厨房伙食的管理工作，全部交由金边华侨负责。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为了顺利完成此项工作，侨社各界全线动员：进步侨团，特别是报社和体育会派出的人员积极投入，务必保障万无一失。而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身兼两职：除自身正常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当义工。时间的紧迫、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辛劳过后都有一份满足感和自豪感。

运动会开幕之前半年，已开始作好全面准备，大批厨房用具，餐饮器皿都由中国运抵金边。工作人员必须将这些器皿分门别类安放于体育城的厨房中。十多个国家参赛，各国运动员加上随从人员，总数近两千人，数目庞大尚在其次，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运动员，都有各自不同的饮食习惯，中餐、西餐、还有回教国家的另类餐饮……种类之多，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为了满足有关方面的要求，厨房工作在大会开幕前已作好充分准备，在热心侨领和侨干们努

力下，柬华侨社几乎作了总动员，集合了水准高超的中、西餐厨师，连当时以流动形式为人办喜宴的流动厨师都在应聘之列。

运动会开幕后，工作人员的任务更加繁杂：食物的安全保障是万万不能出点差错的！柬埔寨是热带国家，炎热的气候是保存食物的大敌，尤其在没有任何冷冻设备的条件下，要搞好如此大型的伙食，更是棘手的难题。但管理厨房的义工们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上下一心，通力合作，费尽心思，想方设法去解决各种难题。冷冻条件虽不足，义工们为了保质、保鲜，每天分数次去采购肉类。更重要的是，必须防范敌对势力从中破坏，负责食品安全的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三班人员全天候监管，务求不出安全问题。义工们高度自觉，尽心尽力的工作，终于完成有关当局所赋予的任务。他们出色的表现，不但获得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也给侨社争取到极高的荣誉，让各国运动员留下美好的印象。

正是：争独立，求平等，亚新运会成功举办；当翻译，办伙食，柬国华侨通力支持